

金惠顺诗歌中的佛教生态思想研究

杨思楠¹ 邵薇¹

(1.广州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在当代诗歌创作中,金惠顺的诗歌以其对佛教思想的深刻诠释与生态意识的独特表达而备受瞩目。本文以生态批评理论为框架,结合佛教“缘起”“无我”“慈悲”等核心理念,着重探讨其诗歌中自然意象的生态意蕴、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以及女性角色在生态实践中的精神超越,揭示佛教生态智慧如何通过诗歌语言实现从哲学思辨到艺术表达的转化。通过聚焦自然意象的符号化表达、个体与自然的动态关系,以及慈悲精神对生态伦理的启示,能够发掘其诗歌在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构建生命共同体层面的深层价值。

关键词:金惠顺; 佛教生态思想; 缘起; 无我; 慈悲; 生命共同体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韩国生态诗歌对儒释道思想的接受与转化研究”(22CWW012)的阶段性成果。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7.1142

前言

佛教思想的核心概念——缘起、无我、慈悲,构成了金惠顺诗歌的精神内核,也为她的诗歌注入了深刻的生态哲学内涵。“缘起”作为万物相互依存的哲学基础,揭示了世间万物因条件而生、相互关联的本质,与无常和空性的观念紧密相连;“无我”则是对个体自我的超越,是“缘起”思想的必然结果,它要求个体放下对自我的执着,融入更广阔的生命整体;“慈悲”集中体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²作为连接万物的情感纽带,倡导对所有生命的平等共情,为生态伦理提供了情感支撑。缘起—无我—慈悲,从哲学角度提供了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万物相互依存,超越了个人的自我中心,倡导对他者的理解与关怀,促使人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金惠顺的诗歌创作体现了缘起、无我与慈悲的佛家生态观,是对佛教哲学中生态智慧的文学实践。她对自然意象的创造性书写,打破了主客二元对立,呈现出万物互联的生态图景。她的作品延续了东方生态智慧的传统,本文聚焦金惠顺诗歌中佛教思想与生态意识的互动关系,揭示其诗歌在生态危机时代的精神价值。

一、“缘起论”:生态整体观的基础

“缘起论”不仅是佛教的核心哲学思想,也是理解生态整体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佛教中,“缘起”意味着一切现象皆因条件而生,因条件而灭,不存在孤立存在的事物。它揭示了世间万物因条件而生、相互关联的本质,强调生态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陈炎在《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中进一步阐释,佛教的“缘起性空”——万物互相依赖,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通过“消解实体性存在,强调关系的动态平衡”,为生态整体观提供了哲学基础。³金惠顺的诗歌通过自然意象的创造性书写,将这一抽象哲学转化为具象的生态叙事。

作者简介:杨思楠(2004—),女,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东亚文学与文化;

邵薇(1991—),女,首尔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东亚现当代文学;

通讯作者:邵薇

² 潘丹丹:《佛教生态伦理思想探析》,《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68-71页。

³ 陈炎:《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23-30页。

在《鸟之诗集》中，金惠顺宣告：“这本书并非真正的书/它是‘我化身为鸟’的记录”⁴，并坦言：“最终我还是写了《我就是那只鸟》这篇作品，即便我极力抗拒这么做”⁵。这里的“书”（诗集）、“鸟”（存在/意象）、“我”（创作主体）三者形成了闭环式的流动：“我”抗拒书写“鸟”的身份，却最终不得不承认书写的结果就是“鸟”的“写照”；而“鸟”的存在形态（“写照”）又完全依赖于“我”的书写行为，序列中的三者互为缘起，彼此成就，生动体现了“缘起”思想——万物依条件聚合而生，亦随条件离散而灭，不存在孤立、恒常的存在。而这种闭环式的生成关系也暗合华严宗“因陀罗网”的隐喻——万物如宝珠般相互映照，构成无尽缘起的网络。她在诗中强调：“我原以为鸟是我的一部分/实则我也是鸟的一部分”⁶，表明“我”与“鸟”并非分离的实体，而是这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彼此互为组成部分，相互定义。佛教艺术常通过“一即一切”的象征体系表达整体性，金惠顺则通过书—鸟—我的闭环流动，将华严宗“一即一切”的整体性思想，转化为极具张力的现代诗学语言，生动展现了诗歌创作本身即“缘起”法则的例证。

在《挂历》中，金惠顺对生命流转变化的刻画同样精妙。“第二天/白兔死了会变成红兔/因为死后还在流血/很快红兔就会变成黑兔/因为死后还会腐烂。”⁷这里白兔、红兔、黑兔的形态流变，象征着生命由盛转衰，而“兔子死了/既能随意自由地变大/又能变小/能变得像云朵一样大/也能变得像蚂蚁一样小”则强化生命变化的无常感。同时，“偶尔/一只死兔子会转世成沾满血迹的卫生巾”⁸，将兔子的死亡与生命的繁衍建立起一种隐秘联系，“沾满血迹的卫生巾”既指向女性生理的周期性（生），也暗含暴力与死亡的隐喻（血迹）。兔子“死后转世”为卫生巾，将兔子死亡的“血迹”与卫生巾承载的生理“血迹”在视觉上构成呼应。这种并置打破物种边界，将动物的死亡与人类身体的代谢置于同一生命光谱中，诗人用“血”串联生死，朴素地呈现出生死循环中“消逝与存续并存”的本质，把“缘起”思想拓展到了生命形态的流动与融合上。兔子在这些变化中作为一个生命实体的概念被不断打破，展现了自然界的生命的循环和变化，另一方面暗示着万物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和相互联系，看似不同的事物，在生命的循环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当《挂历》以白兔形态的流变揭示了生命在生死循环中的无常性，《女人》一诗则将视角转向社会场域，聚焦战争这一“恶缘”（指佛教中能引发痛苦果报的负面因缘）的破坏性与扭曲力。诗中开篇“当战争的所有大门被撞开，女人们/涌出，堵着门口，摇着头说/‘不在这儿，他不在这儿’”⁹，战争暴力场景瞬间切入，构成后续事件的始“因”。女人们集体撒谎的行为，是对战争暴力的直接抵抗，战争的威胁逼迫她们以谎言来保护男性，形成“战争为因、抵抗为果”的因果链条，这种关联的本质是战争这一“恶缘”对正常轨迹下生命关联的强制扭曲。接着，诗中对于自然的描写：“一棵无花果/阔叶的手掌/藏起了那些未曾开花就已暗结的果/它站在雨中/头不停地摇了又摇”¹⁰，与战争环境相互呼应。无花果“未花先果”的反常生长状态，恰似战争中生命被迫跳过正常发展阶段，直接进入艰难的存续状态，暗喻战争对生命成长规律的破坏。而“站在雨中头不停地摇了又摇”的动态，呼应前文堵门女性的身体颤栗，将自然物与人类置于同一战争背景下，凸显出二者均受战争这一强大破坏性“外缘”的支配与影响，共同呈现出在战争因缘下的无奈与被动，进一步强化了“缘起论”中万物相互依存、同受因缘制约的整体性。暗示着自然也在战争的因缘中受到影响，与人间的苦难相互交织。因此，《女人》一诗揭示了战争作为“恶缘”的本质：它并非简单地建立因果链条，而是以暴力强制性地扭曲、中断、异化万物间本应和谐共生的因缘关系。这种扭曲的根源，深植于人类对权力、资源、自我（“我执”）的极端执着。战争正是“我执”膨胀到极致，将自身意志凌驾于万物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自然法则之上的产物。它颠覆了《风之书》中风与花所象征的和谐因缘，印证了“缘起”法则在人类社会场域中可能遭遇的极端异化形态。

《鸟的诗集》以创作的动态转化呈现生态系统的“因缘网络”本质；《挂历》通过生命形态的流变揭示“缘起无常”的普遍规律；《女人》则以战争语境下的因缘扭曲，反向印证“善缘”与“恶缘”对生态关系的影响。这种从创作过程到生命现象、再到社会暴力的递进剖析，共同印证了“缘起”法则的广阔涵盖：万物皆依条件聚合离散，无孤立恒常之实体；一切关联皆在动态平衡中，却也可能因“恶缘”（如“我执”膨胀的战争）而遭受扭曲。金惠顺的

⁴ Kim Hyesoon: Phantom Pain Wings, Don Mee Choi,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23, p.1-2.

（文中《挂历》源自薛舟翻译；《女人》范静哗翻译；《鸟的诗集》《到处爬的蝴蝶》《大手》《荒山》《梧桐的笑靥》《绽放吧，石油！》《尖叫着》《在传染病房里》由作者翻译）

⁵ Kim Hyesoon: Phantom Pain Wings, Don Mee Choi,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23, p.1-2.

⁶ Kim Hyesoon: Phantom Pain Wings, Don Mee Choi,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23, p.1-2.

⁷ Kim Hyesoon: Autobiography of Death, Don Mee Choi,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18, p.13.

⁸ Kim Hyesoon: Autobiography of Death, Don Mee Choi,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18, p.13.

⁹ David R. McCann: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Korean Poetry, Jiwon Sh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46-248.

¹⁰ David R. McCann: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Korean Poetry, Jiwon Sh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46-248.

诗歌警示我们，所有存在均因因缘而关联，唯有破除“我执”，才能在生命共同体中体认万物共生的本质。下一章将阐释金惠顺如何以身体解构为起点，将“无我”从哲学思辨转化为可感可触的生态实践。

二、“无我”：身体意识的解构与重构

“无我”是佛教中重要的修行境界，作为“缘起论”的逻辑延伸，它强调个体在认知上的转变，从自我中心走向对整体的认同，消解“我执”的迷恋，融入到更广阔的生命整体中。金惠顺通过身体的去中心化书写，将“无我”的哲学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诗歌语言。在她的诗歌中，“无我”境界的书写始终与自然意象的解构重构紧密交织。她以身体意象为切入点，通过三重书写维度，从对身体的祛魅、认知的颠覆，最终抵达与自然合一的终极消融，展现从“个体身体的无我”到“宇宙生态的无我”的认知跃迁。

《到处爬的蝴蝶》在通过密集的“洞穴”隐喻完成对身体实体性的解构后，以蝴蝶蜕变的过程为认知枢纽，将身体解构的物理层面延伸至生态认知的哲学层面，形成从“破身”到“破执”的完整反思链条。诗中“笛子的洞”“平菇的泥泞”“肉体的洞”形成连续的意象链条，将身体解构为被动的能量通道——灵魂如音乐从孔隙中溢出，肉体如泥沼中的菌菇被动生长。而“仿佛从倒下的肉体的孔洞中/充满痛苦的灵魂挣脱而出”¹¹的对照，进一步弱化了“我”的实体性，瓦解“身体即自我”的固有认知。“甩下那么重的肉/卸下永劫记忆的重担”¹²中肉体作为“自我”最直观的载体，承载着身份认同、欲望与痛苦的重量。而“永劫记忆的重担”则更深一层指向时间维度上的执念，记忆将过往的悲喜、创伤与荣耀凝固为“我”的所谓独特性。诗人以剥离肉体的视觉隐喻，直指“自我”作为社会规训与记忆沉淀的虚妄聚合体。将“自我”等同于可剥离的负担，呼应佛教“破我执”的核心思想。当这些重负被卸下，“自我”便暴露出最原始的形态：一具无名的能量容器。这种解构并非终点，而是通过蝴蝶蜕变展开认知反思：“闪电击碎翅膀”使其回归“爬行状态”是对“超越性追求”的否定。这里的“爬行”并非退化，而是对生态平等的认同——当蝴蝶放弃“飞翔”的优越感，其“握着彩虹般的钟声”的试图抓取，便转化为对“存在之轻”的接纳。当蝴蝶被闪电击碎翅膀、回归爬行状态后，“抓取”的执念被消解，它不再执着于“飞翔”的优越姿态，而是以平等的姿态融入自然循环，接纳自身作为生态系统中普通一员的“轻”（即无特殊意义的存在本质）。这种转变意味着放弃对“自我独特性”的执着，承认所有生命形态（如爬行与飞翔）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同等价值，进而接纳万物平等的生存状态。诗中“无心的闪电”作为自然力的象征，击碎的不仅是蝴蝶的翅膀，更是人类对“自我独特性”的执念，迫使人类直面“我”作为能量载体的本质。

《到处爬的蝴蝶》在完成对身体实体性的解构后导向了认知层面的反思。同样的反思在《大手》中有更深层的体现，诗人通过“不可见”与“可见”的辩证，揭示“自我”的虚妄性。诗中“能看见的人”象征沉溺于物质、功名等表层生活的个体。他们执着于“可见世界”——职场头衔、银行账户、社交标签，误以为这些外在符号是“自我”的全部。“每天将可见世界塞进永劫黑洞”¹³则揭示这种执念的徒劳：就像往无底洞填土，越是追逐可见的标签，越陷入空虚的深渊，遗忘了真正的存在源于“被孕育/在看不见的地下”¹⁴的自然联结。诗中“我”的诞生始于“看不见的地下”。根系在黑暗中吸收养分、菌丝在土壤中传递信息——这些不可见的生态活动，才是生命的真正源头。如同树木的枝叶依赖地下根系，人类的“自我”本质也扎根于不可见的深层存在——集体无意识与自然本能之中，而非社会的标签。社会赋予的“可见身份”不过是枝叶上的露珠，阳光下短暂闪烁，根系才是永恒的生命力。“去那个再也看不见的世界”¹⁵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对认知枷锁的打破。当个体沉入这片黑暗（如贴近土地劳作、静观草木生长），社会强加的“成功标准”便如枯叶般脱落，露出本真的生命状态。“在看不见的地底下/喷涌而出”¹⁶更将“不可见”升华为存在的本源。腐烂的落叶化为养料，蚯蚓的穿行松解土壤，微生物的代谢孕育生命——这些不可见的活动构建起生态系统的根基。而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诗歌、科技、城市），不过是地下能量喷涌至地表的副产品。正如诗中“树木是根系的外在表达”，人类的“自我”也只是生态网络的外显碎片。我们不是地表的主宰，而是地下根系的延伸；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自然循环的参与者。诗中“地下”既是物理空间，也是精神维度的“无我之境”：当个体沉入“挖不完的黑洞”，放下对“可见自我”的执着，便能在“树木与根系同构”的意象中，体认到人类作为“自然根系网络节点”的本质。

当个体从身体到认知完成对“自我”的解构，《荒山》将视野拓展至宇宙纬度，以“荒”为眼，洞见文明遮蔽下的生态本真，深刻展现了个体自我的消解与生命共同体的构建过程。诗中“从世界得来的名字很荒谬”¹⁷直接否定

¹¹ 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5年，第1页。

¹² 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5年，第1页。

¹³ 金惠顺：《我们的阴翳》，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0年，第36页。

¹⁴ 金惠顺：《我们的阴翳》，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0年，第36页。

¹⁵ 金惠顺：《我们的阴翳》，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0年，第36页。

¹⁶ 金惠顺：《我们的阴翳》，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90年，第36页。

¹⁷ 金惠顺：《在桃花下沉睡》，首尔：创作与批评社，2003年，第8页。

社会赋予个体的标签化存在,而“光着身子的你沿着光秃秃的脊骨飘来”¹⁸的意象,则象征着卸下“人类文明外壳”的本真状态。姓名、身份、地位等在社会语境中被视为自我标识的符号,在诗人眼中不过是文化建构的虚幻表象。这些“名相”如同枷锁,束缚着人们对真实自我与自然本真的认知。而“荒山”所代表的无名、无拘的状态,恰恰是摆脱这种虚幻,回归自然本质的象征。它暗示着,当个体挣脱社会赋予的“假我”,才能真正触碰到世界的原始与真实。“身体是今天的神殿”这一意象则将个体与自然的关系升华为神性共生:当“你”与“我”的界限在荒山情境中模糊,个体褪去文明外衣转化为纯粹感知体,人类与自然共同成为神性载体,每一阵风、每一株紫芒、每一寸肌肤与自然的触碰,都成为宇宙生命共同体的神圣见证。“无法理解的东西如大腿上的阳光”进一步隐喻理性“自我”的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直觉层面的天人合一——此时“所有相关者的裸体在风中发光”,人类、草木、虫蚁等一切存在抛却差异,共浴自然之光,具象化呈现“无我”状态下的生命共同体。“荒山”在此超越地理范畴,成为人类精神原乡与未被文明侵蚀的自然象征。个体生命化作宇宙精神的流动通道,在“无我”之境中实现生态与精神的双重超越,达成与万物在宇宙维度的深度联结。

三首诗歌形成清晰的认知递进:《到处爬的蝴蝶》从身体的物理性剥离出发,以“洞穴—蜕变”意象否定“自我”的实体性;《大手》通过“根系—地下”叙事,将“无我”延伸至认知层面的“去表层化”;《荒山》则以“裸体—宇宙”的宏大视野,完成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这种递进的本质,是从“个体身体的无我”到“物种关系的无我”,最终抵达“宇宙生态的无我”。当人类以“非主体”姿态融入自然,理性认知的“自我”随之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直觉层面的“天人合一”,指向生命共同体的归宿——唯有消解“我”的边界,方能抵达万物共生之境。

三、“慈悲”:生命共同体的情感建构

“慈悲”作为连接万物的情感纽带,在金惠顺的诗歌中表现为一种“生命对生命的平等共情”——它是破除“人—自然”“自我—他者”二元界限的情感力量,其核心在于承认万物作为生命主体的情感连通性。这种慈悲不同于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基于“缘起论”和“无我说”的认知前提:当万物被理解为因缘网络的节点,“我”与“他者”的界限趋于消融,对他者的痛苦与喜悦的共情,便成为生命本能的自然流露。金惠顺的诗歌将这种抽象的慈悲转化为可感的诗性经验,具体体现为对身体本能的接纳、对自然苦难的共情、对跨物种痛感的共振,以及对生态命运的整体性关怀。

《梧桐的笑靥》以女性群体在自然中的生理行为切口,颠覆性书写“身体羞耻感”,呈现从个体身体解放到建立“人—自然”生命共同体情感共振的慈悲实践过程。诗中年轻女性对生理声响的“羞赧”本质上是社会文明规范加于个体的精神枷锁,而老年女性“多痛快的声音”的坦然,则是对这种精神枷锁的自觉反抗。关键的情感转折点在于“满租率先笑裂了寂静”引发的群体笑声——这种未经理性过滤的情感爆发,恰是情动理论(聚焦身体先于意识的情感反应机制)中“传染式共振”¹⁹的诗性呈现:笑声这一感官符号经由听觉刺激引动无意识模仿,在“羞赧—坦然”的瞬间转化中瓦解因羞耻感形成的心理隔阂。此时的“笑”超越了情绪表达,升华为慈悲心对“身体平等”的初步实践:通过接纳生理本能自然性,确证人与自然生命基质的同源性。而梧桐树“以年轮的眼慈祥俯视它的女儿们”的拟人化书写,赋予梧桐“年轮之眼”的生命刻度与“慈祥”的情感能力,使其跃升为具有情感关怀的“生命共同体的情感主体”。人类身份被重置为“女儿们”,标志身份认同的根本转向:从视自然为被征服的客体(主宰),转向自视为自然所孕育的子嗣(共生)。最终,梧桐的“慈祥”凝视与女性的“痛快”体验交织共振,形成情感共振,驱动了对“人—自然”二元解构,为“生命共同体”奠定了初步的情感平等与接纳基础。

《绽放吧,石油!》则转向对工业文明掠夺逻辑的批判,并通过赋予石油强烈的主体性与情感能力,唤起跨物种的共情。诗人将石油喻为“母亲身体深处的黑血”²⁰,并通过其“因我而起的肮脏战争永不停歇”²¹的自白,将自然纳入“可感知痛苦的生命主体”范畴。当石油被赋予“黑血”的身体属性与“战争自白”的情感能力,人类对其掠夺行为便不再是单纯的资源开发,而转化为对生命主体的暴力伤害。这种主体化书写使石油的苦难成为可感同身受的生命悲剧,有效破除了物种壁垒,建立对自然作为“苦难主体”的深切共情。

在这首诗中,石油不仅是可感知痛苦的生命主体,还是施与慈悲的主体。石油“想以花朵覆盖孩子皴裂双足”的自我牺牲愿望,完成了从“苦难主体”到“慈悲主体”的身份跃升。这一意象体现佛教“拔除他者痛苦”²²的慈悲思想——石油作为工业文明的受害者,却试图以“花朵”这一纯粹的美与温柔,去抚慰“孩子”因贪婪而龟裂的生存

¹⁸ 金惠顺:《在桃花下沉睡》,首尔:创作与批评社,2003年,第8页。

¹⁹ 田林楠:《从个体情动到社会性情绪——情动理论视角下的集体情感》,《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83-93页。

²⁰ 金惠顺:《在桃花下沉睡》,首尔:创作与批评社,2003年,第87页。

²¹ 金惠顺:《在桃花下沉睡》,首尔:创作与批评社,2003年,第87页。

²² 方立天:《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文史哲》2004年第4期,第68-72页。

困境。其中蕴含着一种非功利的关怀——试图以自身（花朵）去抚慰他者（孩子）因工业文明失衡而承受的苦难，与人类现实中以牺牲自然（石油）换取发展的冷酷逻辑形成冲突。这种冲突源自慈悲与共情共有的“反工具理性”特质——当石油不再仅仅被视为“能源工具”，而被赋予主体性的痛苦、愿望以及主动关怀他者的意向时，人类与其的情感联结便超越“利用”的功利联结，建立对自然痛苦的共情联结。石油的“绽放为花”之愿与其最终沦为“盛满黑骨的陶瓮”之现实形成强烈对比，而石油的“黑骨陶瓮”与人类的“皸裂双足”在诗中形成物质与情感的双重呼应，二者在“承受工业暴力”的苦难共同体中实现了生命平等。这种平等认知，正是慈悲与共情的共性根基——唯有承认自然与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平等地位，才能催生“视自然痛苦为己出”的慈悲情怀。

《尖叫着》继续通过共享的痛感共享打破物种壁垒，建立深刻的“苦难共同体”。诗中“树木光秃秃的肉/挨了一顿毒打”²³的拟人化书写，赋予自然以人类的疼痛感知；“我们的头发相连”²⁴则突破物种壁垒，使人类与树木成为“苦难共同体”的成员。“十根手指/像扇骨一样展开”²⁵的肢体变形叙事，不仅是边界模糊，更是慈悲共情导致的身体感知和身份认同的主动融合，是主体对他者痛苦形式的具身化接纳。个体的“我”在“我们—树木”的集体悲鸣中消融，代之以一个基于共同苦难的“我们”。当“寒冷的冬夜/山林的树木以更洪亮的呼啸声吞没一切/挥动双腿”²⁶的超现实场景展开，自然不再是沉默的客体，而是与人类同等的“尖叫者”。这种痛感的平等分配，迫使读者直面生态危机的本质：不是“人类对自然的破坏”，而是“生命共同体的集体创伤”。诗歌以动态的痛苦共鸣，将慈悲共情在深度（痛感）与广度（跨物种）上推向高峰，使“苦难共同体”成为“生命共同体”最坚实、最令人震撼的情感内核。

《在传染病房里》以灾难叙事将慈悲共情和对“共同体”的认知，提升至宏观、整体、宇宙性的维度，在情感层面具象化生态命运相连的本质。诗中“岛屿”的逐一沉没，隐喻着生态危机如同传染病一般，具有强大的连锁反应和扩散性。当“一个孤独的岛被海浪淹没”²⁷，“剩下的岛屿/到处晃来晃去/一直在喊冤啊，冤啊”²⁸通过岛屿之间的相互关联与集体焦虑，生动地传递出一种弥漫性的生态恐惧与命运相连的悲怆情感。“摇摇晃晃”不仅是物理晃动，更是心理崩溃的肢体映射，而重复的“喊冤啊”以声音震颤直接外化冤屈、恐惧与不解的集体情绪，情动张力达到高潮。全诗以能“看见存在的东西”作结，这“看见”并非孤立的情动词汇，而是对前述层层递进的身体化情动体验（淹没的窒息、哭诉的震颤、吞噬的冰冷、塞住嘴的压抑、波涛侵入的触痛、撒土的死亡仪式）的凝练与超越。它要求人类以躯体共感（而非仅以理性认知）去体认“淹没”“吞噬”“摇摇晃晃”“冤啊”“塞进嘴里”“进出”“撒土”所传递的生态痛感，进而超越个体私利，在情感共振中以“缘起”视角“看见”：所有生命在生态危机中都是“被淹没的岛屿”，唯有以慈悲之心感知他者痛苦，才能建立“生命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诗歌正是通过极具身体性的情动符号链，将“慈悲共情”具象为可感可痛的神经震颤，以慈悲之心“看见”万物在危机中的情感联结，从而唤醒对生命共同体的终极关怀。

四首作品构建起一个清晰的慈悲情感生成与深化的情动谱系：《梧桐的笑靥》通过情感表达（笑声）启动情感流通，达成“个体身体共情”向“自然群体共情”的转变，奠定共同体情感接纳基础。《绽放吧，石油！》赋予自然以主体性的痛苦与关怀意愿，揭示工业掠夺的伦理暴力，唤起读者对自然作为苦难/关怀主体的深度共情与平等认知。《尖叫着》通过极致的跨物种具身化情感表达，在深度痛感中构建“物种情感共振”的苦难共同体，激发行动驱动力。《在传染病房里》以宇宙性灾难隐喻（岛屿沉没）呈现生态命运绝对互联，最终以“看见”召唤基于整体性慈悲共情的“生命共同体”意识与实践。

结语

金惠顺的诗歌远非对佛教教义的简单图解，而是通过意象的动态转化、身体的诗学解构、情感的跨物种共振这一三位一体的策略，将佛教“缘起-无我-慈悲”的生态哲学，转化为一种具有强烈现实介入力量的生态诗学。通过对“缘起”法则的深刻体认，其诗歌以循环流转的自然意象系统生动呈现了万物互联互通、互为条件的生态整体性，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根基。“无我”境界的达成，则体现为一系列极具冲击力的身体解构与认知颠覆书写——从祛魅肉体实体到剥离社会假面，直至在宇宙尺度上消融个体边界，引导读者在强烈的感官与认知冲击中体认“我执”之虚妄，最终导向与自然本体的融合。而“慈悲”精神的灌注，则升华为一种跨物种的生命共情机制——无论是接纳身体本能以重建人与自然平等，赋予自然物以主体性的苦难与关怀，还是共享痛感以构建“苦难共同

²³ 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5年，第24页。

²⁴ 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5年，第24页。

²⁵ 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5年，第24页。

²⁶ 金惠顺：《父亲树立的稻草人》，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5年，第24页。

²⁷ 金惠顺：《在另一个星球上》，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1年，第26页。

²⁸ 金惠顺：《在另一个星球上》，首尔：文学与知性社，1981年，第26页。

体”，都深刻彰显了基于“缘起”与“无我”的生态伦理情感。这种情感在灾难隐喻中，最终凝聚为对生态命运互联的体认与整体性关怀。

金惠顺的诗歌创作不仅提供了东方生态智慧的当代文学样本，更以震撼人心的艺术方式，在生态危机时代叩击灵魂，为重建文明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指明了一条经由精神超越抵达生态觉悟的救赎之路，为理解生命共同体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参考文献：

- [1] 潘丹丹,佛教生态伦理思想探析[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6(4):68-71.
- [2] 陈炎,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 [3] Kim Hyesoon, Phantom Pain Wings, Don Mee Choi,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18. 金惠顺, 幻痛之翼[M], 崔都美译, 纽约:新方向出版社, 2018.
- [4] Kim Hyesoon, Autobiography of Death, Don Mee Choi,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2018. 金惠顺, 死亡自传[M], 崔都美译, 纽约:新方向出版社, 2018.
- [5] David R. McCann,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Korean Poetry, Jiwon Sh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246-248.
- [6] 金惠顺, 父亲树立的稻草人[M], 首尔: 文学与知性社, 1985 年。
- [7] 金惠顺, 我们的阴翳[M], 首尔: 文学与知性社, 1990 年。
- [8] 金惠顺, 在桃花下沉睡[M], 首尔: 创作与批评社, 2003 年。
- [9] 田林楠, 从前个体情动到社会性情绪——情动理论视角下的集体情感[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3):83-93.
- [10] 方立天, 中国佛教慈悲理念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J], 文史哲, 2004(4):68-72.
- [11] 金惠顺, 在另一个星球上[M], 首尔: 文学与知性社, 1981.

The Buddhist Ecological Thought in Kim Hyesoon 's Poetry

Yang Sannan¹, Chen Yuyi², Shao Wei*

¹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poetry creation, Kim Hyesoon 's poetr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or its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Buddhist thought and unique expression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takes ecological criticism theory as the framework and combines the core Buddhist concept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non - self," and "compassion." It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natural imagery,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the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of female figures in ecological practice in her poetry. It reveals how Buddhist ecological wisdom is transformed from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to artistic expression through poetic language. By focusing on the symbolic expression of natural imagery,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nature, and the inspiration of compassion for ecological ethic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ep - rooted values of her poetry in dissolving anthropocentrism and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life.

Keywords: Kim Hyesoon; Buddhist Ecological Thought; Dependent Origination; Non – Self; Compassion; Community of Life.